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年度报告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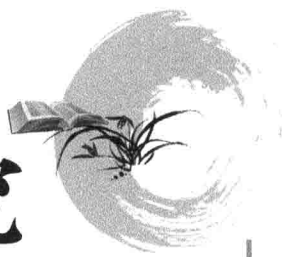
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

●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年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



文化研究 Annual Report of Cultural Studies 年度报告

(2012)

● 陶东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2 / 陶东风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097 - 5270 - 8

I. ①文… II. ①陶… III. ①文化研究 - 研究报告 - 中国 - 2012

IV. ①G0 -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141 号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2)

主 编 / 陶东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许 力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兰春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张 / 22.75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数 / 366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 (2012)

主 编 陶东风

副主编 邱运华 王德胜 宋月华

编辑部主任 胡疆锋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陈光兴 高丙中 黄卓越 鲁晓鹏 陆 扬

罗 钢 汪民安 王 宁 王晓路 王小明

徐 贲 张英进 赵 勇 周 宪

编写组成员

王 毅 杨 玲 罗 靓 李会芳 符 鹏

蒋 璐 盖 琪 陈国战 郑以然 翁立萌

杨宇静 王峥嵘 徐 铮

外国学者

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 英国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UK)

约翰·斯道雷 (John Storey), 英国桑德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已经编辑完毕，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备受瞩目的前沿学术领域，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诞生于英国起，文化研究已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其间它四处出击，敞开怀抱吸纳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积极介入当代文化与学术政治，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也最具争议性的学术思潮之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文化研究思潮涌入中国大陆，立即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生产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极大地重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最近几年，文化研究不仅已经形成浩大的声势，进入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而且将自己的方法、立场和旨趣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之中，可谓到处播种，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

为了及时反映文化研究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我们从 2010 年开始出版《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0 年度、2011 年度的报告已经出版。现在 2012 年度的报告也已编辑完成。

本《报告》主要由四大板块组成：

第一个板块为“年度论文”，精选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我们认为能够代表文化研究动向和水准的论文。这是《报告》中分量最重的板块。

第二个板块为“文化研究工作坊”。本板块参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坊》，意在探索一种工艺，力求把一个产品（在我们这里就是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机制、环节、技术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呈现产品本身。这就像带一个人参观一个制作工艺的流程。因此，这个板块除了发表我们认为是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有价值的原创性调研报告和民族志访谈）外，还希望作者尽量细致地“交代”自己的研究过程（选题缘起、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写作进展、修改加工等）

涉及的各个环节。

本期的“工作坊”集中发表了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等教师，带领他们的几个弟子解读、讨论、分析詹明信教授几个重要理论文本及其翻译的文章，主题集中，讨论深入，也颇能体现“工作坊”栏目的编辑设想。在此对为我们辛苦组织这组文章的曾军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第三个板块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2012 年度文化现象扫描及大事记。主要记录 2012 年发生的热点文化现象，以具有知名度、流行度的大众文化现象为主。此处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取其广义，颇似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因而，在我们选取的文化热点中，既有偏于文艺思潮的“宫斗剧”“屌丝文化”，也有属于公共文化事件的“手抄讲话”“莫言获奖”。在此大文化观念的指导下，我们试图比较全面地勾画出 2012 年度中国的文化地形图。

二是，文化研究重要著述介绍。这部分主要介绍本年度重要的文化研究著作，兼及大陆本土学者的原创性著作和翻译介绍的西方著作。但目前限于中文著作，暂不涉及中文之外的著作。

第四个板块是文化研究大事记。这个板块辑录、整理本年度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影响大、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史料价值的重大事件，如文化研究重要机构的成立及其活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的举办、重要论著的发表等。自 2010 年起，我们就希望这个版块除了大陆以外，还应该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其他一些文化研究比较流行的国家。但由于操作上的困难，目前对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的介绍往往很不全面。值得欣慰的是，本辑《报告》在这个版块上有很大改进，内容涵盖了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应该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状况，而且撰写者队伍也越来越固定。我们深知做大事记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而最后提炼出来的干货却就那么几页。我们对本板块的作者致以特别的谢忱，并恳切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年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曾经出版过自己的工作论文和工作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人希望《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既是年度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工作总结和资料汇编，又是文化研究工作者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工

作坊。我们诚挚地邀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文化研究工作坊，大家一起为它添砖加瓦。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胡疆锋，由于我这段时间杂事繁多，精力不济，本辑《报告》的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其间我还几次萌生了放弃《报告》编辑计划的念头，也都是疆锋鼓励我坚持下去，并表示具体的编辑选稿工作他可以多做一些。因此，这个报告能够继续出版到今天，完全是疆锋的功劳。

陶东风

2013年7月20日

目 录

年度论文

- 3 | 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 陶东风
- 21 | 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 / 赵 勇
- 30 | 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
——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种 / 邵燕君
- 47 | 文化研究者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
——兼谈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 / 孟登迎
- 58 | 伦理巨变与 21 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 / 周志强
- 77 | 当代官场小说的权力伦理 / 胡疆锋
- 92 | “现代”主体的浮现与历史记忆的改写
——以“幻灯片事件”、《鬼子来了》、《南京！南京！》为例 / 张慧瑜
- 105 | 以诗维权：管窥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 / 黄志辉
- 119 | 网络追文族：读写互动、共同体与“抵抗”的幻象 / 黎杨全
- 136 | 黑色作为一种文学理想
——就文学如何表现创伤性记忆与刘复生商榷 / 朱 军

文化研究工作坊

- 149 | 细读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曾 军

- 152 | 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访谈录 / Fredric Jameson 曾军 傅俊宁整理 吕亚南译
- 162 | 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 车义伟
- 167 | 倒置的千禧年?
——理解詹明信思想的宗教之维 / 李 晨
- 173 |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詹明信与赛色朗尼之间的对话 / 王 晨
- 179 | 从两个中译本看港、台、大陆中文学术风格之区别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 / 谢 非
- 186 | “晚期”资本主义:“极境”还是“晚近” / 殷晓璐
- 193 | 激情的消逝: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批评态度的变化 / 朱春艳
- 198 | 语词之后:写作的政治性 / 余 琴
- 203 | 美感的民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筑 / 周盛伶

中国大陆热点评述和研究综述

- 211 | 置身事内:历史认知的使命与文化时评的位置
——2012年文化热点评述 / 符 鹏
- 236 | 文化研究年度重要著述评论 / 翁立萌
- 253 | 文化研究大事年表 / 杨宇静

文化研究大事记

- 265 | 中国台湾 / 杨 玲
- 287 | 中国香港 / 蒋 璐 曲舒文
- 295 | 美国 / 罗 靓
- 306 | 澳大利亚 / 王 毅
- 319 | 欧洲 / 李会芳 常海英



年度论文

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陶东风^{**}

内容提要：本文集中探讨了作为我国文化建设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具备什么样的形态和特征，才能和大众文化形成良性关系，并得到大众发自内心的拥护，落实在自己的日常行动中。本文认为，要做到这点，关键是实现两个转化，即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再由主导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就是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文章通过好莱坞电影的例子指出，由于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传达的都是一个社会中占多数的大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两者应该而且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主导文化 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 葛兰西 布迪厄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它当作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升到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方式的高度。六中全会《决定》^①指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样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倡导，而且要落实和践行，使之真正得到大众拥护，因而能够落实在自己的日常行动中。

我以为，落实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让它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22）的阶段性成果。

^{**}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全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流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而赢得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转化,如果离开了大众文化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达到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核心价值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一 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领导权

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三分法出现于1980年代,并一直沿用至今。六中全会郑重提出并写入全会《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显然属于真正的官方文化。但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如果说官方文化是官方倡导的文化,那么,主流文化则是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真正支配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的那一套价值观。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被称为“市民社会”(又称“私人领域”)的整个民间组织,也就是由教会、学校和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化领域或公民活动领域,以非暴力为基本特征;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狭义的国家),主要由政府、军队、警察和司法机构等组成,以暴力或强制为主要特征。^①上层建筑的这两个层面又分别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建构和运作的,它作用于“大众哲学”或“共识”,引导大众自发地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关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解释;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发挥着“直接的支配”作用,由国家警察机构或司法部门实施强制性命令。^②

可见,“领导权”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用来指称与赤裸裸的压迫和强权不同的、常常并不被经验理解为统治的统治关系。它不是表现为强制,而是表现为通过被统治者的积极赞成(consent)而实施的统治(正因为这样,把cultural hegemony翻译为“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这正是这个概念的精微与深刻之处:文化领导权比以赤裸裸的武力和强制为基础的统治

①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页。

② Antonio Gramsci: "On Intellectuals," see Jessica Munns & Gita Rajan Longman (ed.):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 102.

权更为含蓄、复杂、多元，它暗示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础的新统治形式，常常是以被统治者的默许与配合为基础的。葛兰西还认为，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总是依据社会文化条件而被不断地修正，它们不但是更加精致的，而且是可以商谈的。

虽然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我们不能机械照搬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这个概念至少启示我们：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真正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持，可以强迫人民服从，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官方文化如欲转化为主流文化，亦即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获得大众的真正认同，必须通过非暴力手段（比如民主协商、对话、谈判等）达成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常识”），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无奈的服从。而这种赞同之所以是“自愿”“积极”的，乃是因为它不仅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对话和民主协商基础上，而且也不像精英知识分子的小众文化那样曲高和寡。它融入葛兰西所说的大众“常识哲学”之中，从而成为思想、文化、舆论领域非强制却又强有力的引领力量。

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赞同？当然只能是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如果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如果三者的价值观真正统一了，那么，官方文化就转化为主流文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这样一种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主流文化或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必须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更不要说众多的个人，都有不同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等，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①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不充分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留下足够大的自由空间。只有这样，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被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所接受，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才能促进而不是破坏社会和谐。只有一个包容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异质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也是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和高度同质化的古代社会的和谐形态存在根本区别，也和那些奉行单一宗教信仰的政教合一社会的和谐形态存在根本区别。如果在一个世俗多元、差异的社会奉行单一、狭隘、排他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导致尖锐的社会冲突。

其次，这样一种与多元社会、多元价值观相适应且具有开放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基础性、广泛性，能够适应全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是对每个公民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换言之，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是低调的公民道德，而不是高调的圣人伦理或英雄道德；是一种世俗性道德，而不是宗教性道德。它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灭绝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同时必须强调，核心价值体系是面向全民的，而不只是面向共产党员或其他模范人物的，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而不只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因此，它也不能是那种只适合模范人物、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高端道德标准，而是一般公民都能够达到，也应该达到的基本道德标准。《决定》指出要“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 and 精神”^①，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的普适性、基础性和广泛性。

如果我们借用社会学家涂尔干对道德划分的理论，那么核心价值体系当属公民道德。涂尔干把规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规范，另一种则仅适合于某些特定群体（这些特定群体依据职业、性别、年龄等特殊属性界定）。前者是道德普遍主义的，属公民道德或共同道德；后者是道德特殊主义的，属特殊社会群体（如职业群体）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如职业伦理）。关于前者，涂尔干写道：“这些规范与普遍意义上的人是相应的”，“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同胞来说，所有规范都必须依据尊重人、推动进步的原则，对所有人而言，这些规范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都无一例外地同样有效”^①。关于后者，作者指出，“这些伦理（职业伦理——引者注）与共同意识并无深层的联系，因为它们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伦理，换言之，它们与共同意识无关”^②。核心价值体系显然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

毋庸讳言，我们以前由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普遍性道德和特殊性道德、世俗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公民价值观和政党价值观不分现象，导致其代表性、包容性、基础性、广泛性的不足。它往往把特定阶级、群体、集团的价值观当成了全民的价值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道德特殊主义或价值观特殊主义倾向，不利于赢得最广泛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成为大众的普遍共识。对此，大众常常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即使不明确对抗或反对）。最近有学者提出了“良知恰到好处地展现”的命题，指出：“我们从小树立伟大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对最为基本的人性尊严、人生常识等却茫然无知；记诵了许多高深莫测的思想，但在社会现实中，却对最基本的生存正义无动于衷。教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催生着怀疑与虚无主义。”^③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 核心价值体系应作为常识哲学融入大众文化

现在让我们引入葛兰西的“常识哲学”概念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常识哲学”是葛兰西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含义与“大众哲学”“自发哲学”等概念相似。“常识哲学”就是大众普遍拥有的，既广泛流行又不那么精致专业的思想和价值观，葛兰西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哲学认为，哲学的目的是实践，是改造世界，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实践哲学，而实践又必须是群体的、大众的而非个体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哲学必然是集体的而不是少数个体的事务，“哲学并不只是少许专业知识的抽象思考，而是一切人都在默默从事的具体的社会活动”^④。在这

①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页。

②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页。

③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郭美华语，参见《重申道德常识 构筑有预期的社会》，《时代周刊》2011年第42期。

④ 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第1页。

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是哲学家”——“人类的大多数，在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或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的范围内，人人都是哲学家。”^① 常识哲学（或自发哲学、大众哲学）不是存在于职业哲学家的高度个人化、专业化的著述中，而是存在于语言本身（这种语言不是在语法上抽空了内容的词语总汇，而是特定的观点与概念的总体），存在于常识（common sense）或“健全的识见”（good sense）以及“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中。而这种“大众宗教”，又不同于体现在高深经典中的宗教，而是存在于大众的整体信仰、观念、迷信以及观察与行为方式中，即通常说的“民俗”（folklore）中。^②

这即是说，哲学不仅包括哲学家的哲学，而且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③。或者说，哲学与哲学史的三要素是：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大众哲学（民俗/广大群众的宗教）。

葛兰西之所以如此看重大众哲学或常识哲学，根本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了官方文化要想赢得文化领导权，其前提就是赢得大众，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或“民间故事”，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化。

我认为，一旦官方文化因其广泛的代表性、基础性、流行性而成为真正支配大众日常生活的常识哲学、大众哲学、大众共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亦即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的问题，以及官方文化如何转化为大众文化、如何在大众文化中得到表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一个社会的“常识哲学”，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普通人普遍拥有的价值观，普通人都能达到的基本道德。我们上面提到的常识哲学的各种特征，比如大众性、基础性、广泛性等，其实也都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特征。

无论在审美形式上还是在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上，大众文化都是低门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第26～27页。

② Antonio Gramsci: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see *Culture and Society*, J. C. Alexander and S. Seidma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7.

③ 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第27页。